

论文集



吕留良 与崇德人文

徐玲芬 主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



论文集

吕田良与崇德人文

吕田良题



徐玲芬 主编

和韻皆破言也國作正解

何山陰氏語生堂藏書三十餘年
小大
阿的銘識墨猶斯大攝輪動直銀說與癡兒
休笑例難身費世好書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吕留良与崇德人文 / 徐玲芬主编.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540-1145-4

I. ①吕… II. ①徐… III. ①吕留良(1629—1683) —人物研究 IV. ①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0989号

吕留良与崇德人文

徐玲芬 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电话: 0571-85176986)

网 址 www.zjguji.com

责任编辑 吴迪

责任校对 余宏

责任印务 楼浩凯

照 排 杭州立飞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4.75

插 页 4

字 数 393千字

版 次 2017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0-1145-4

定 价 8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前言：试论吕留良的思想文化成就

吴 光 徐 正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著名学者，又是诗人、时文评选家、出版家。吕留良博学多才，涉猎甚广，在哲学、文学、艺术、宗教、出版、医学、教育诸领域均有精深造诣。清代名士郑板桥对吕留良推崇备至，赞扬吕留良：“自批点文章而外，尚有二十四绝技，如医学、女工、驰射，皆精妙绝伦。”（郑板桥《板桥先生印册》）吕留良一生著述甚丰，计有《吕晚村文集》八卷、《续集》四卷、附录《行略》一卷、《东庄吟稿》七卷、《吕晚村先生论文汇钞》不分卷、《天盖楼杂著》不分卷、《惭书》一卷、《晚村先生家训》五卷、《东庄医案》一卷、《天盖楼砚述》一卷、《晚村砚铭》一卷、《御儿吕氏婚礼通俗仪节》一卷等。吕留良评点的时文集有《天盖楼偶评》六卷、《程墨观略》十九卷、《江西五家稿》五卷等。汇集他的语录、讲义、时文评语成书的有《天盖楼四书语录》四十六卷、《四书讲义》四十三卷、《吕子评语正编》四十二卷、《吕子评语余编》八卷等。吕留良与人合著、选评之作有：吕留良、吴之振、吴自牧合作选编的《宋诗钞》九十五卷，与张履祥合选的《四书语类钞》三十八卷，吕医山人评《赵氏医贯》六卷，另有辑录亡友遗著题为《质亡集》等。此外见于清代《禁书总目》的还有《易经详解》《诗经详解》《四书题说》《天盖楼述评》等。近有桐乡籍学者俞国林先生新编《吕留良全集》（十卷本），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于2015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全集》

第一、二册收录《吕晚村先生文集》八卷、《续集》四卷、《文集补遗》十卷，及附录吕葆中《行略》《吕留良年谱简编》等；第三、四册收录《吕留良诗笺释》八卷；第五、六册收录《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四十三卷、《四书章句集注》四章；第七、八、九、十册收录《吕子评语正编》四十二卷、《余编》八卷，附刻《亲炙录》等。

综观吕留良的思想文化成就，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成就

吕留良的思想成就，主要表现为“夷夏之防”与“尊朱辟王”两大方面：

（1）“夷夏之防”论

吕留良思想中最突出、最有影响并且使他受祸的思想主张是他的“夷夏之防”论。他的“夷夏之防”论包含三大思想主张：一是“尊王攘夷”论，二是“复井田、封建”论，三是民族气节论。

吕留良多次以《春秋》经传所载齐桓公“尊王攘夷”事迹以及《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赞语为例，表达了他强烈的反清思想。他说：“孔子何以许管仲不死公子纠而事桓公甚至美为仁者？是实一部《春秋》之大义也。君臣之义固重，而更有大于此者。所谓大于此者何耶？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于被发左衽也。”在吕留良看来，儒家经典中所讲的君臣伦理固然很重要，但还有更重要的伦理，那就是“夷夏之防”。这明显是针对由“夷狄”入主“中原”的清王朝政权的。

我们还可以从清王朝雍正帝用以声讨吕留良“罪行”的谕旨及其亲撰的《大义觉迷录》中看到吕留良“反清复明”思想的激烈程度。

清王先谦编的《东华录》雍正七年卷记载了曾静案的来龙去脉。卷内所载曾静的供词说：“（静）因应试州城，得见吕留良评选时文，内有妄论‘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语，遂被蛊惑，随遣张熙至浙江吕留良家乡石门县访求吕留良遗著。张熙在石门见到吕留良之子吕毅中，吕毅中将伊父所著诗文赠张熙，留良诗文内皆愤懑激烈之词，于是益加倾信。张熙又往访吕留良之徒严鸿逵与鸿逵之徒沈在宽等，与之往来投契，因致沉溺其说，妄生异心。”案发后，雍正帝在谕旨中大骂吕留良“悍戾凶顽，好乱乐祸”，“追思明代，深怨本朝”，“以博学鸿儒荐则诡云必死，以山林隐

逸荐则剃发为僧”，“号为明之遗民……著邪书，立逆说，丧心病狂，肆无忌惮……所著诗文以及日记等类……皆世人耳目未经，意想所未到者。……何其悖乱之甚乎！”这样的“大逆不道”，在清朝统治者看来自然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了，所以雍正帝恨极了吕留良，不仅对吕氏父子剖棺戮尸，而且要株连其家族。不仅如此，雍正帝还因吕留良而株连浙江一省之人，竟称：“朕向来谓浙省风俗浇漓，人怀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谤讪悖逆，自伏其罪，皆吕留良之遗害也。甚至民间氓庶，亦喜造言生事。……此皆吕留良一人之为倡导于前，是以举乡从风而靡。甚至地方官吏，怵其声势之器凌，党徒之众盛，皆须加意周旋。……此其陷溺人心、浊乱世俗，害有不可胜言者。”由此可见吕留良的“夷夏之防”论对于以满洲贵族为主宰的清朝统治者的威胁有多大了。雍正帝也并不像现在某些电视剧所描写的是那种“仁德之君”，而是一位本质上残忍、专制的帝王。

吕留良的“复井田、封建”论是与其“夷夏之防”论合为一体的。诚如曾静供词所说，他是“得见吕留良评选时文内有妄论‘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语”才被“蛊惑”，乃致“沉溺其说，妄生异心”的。那么，吕留良的“井田、封建”论的主张是怎样的？我们大致从流传至今、由吕留良评选而由其门人陈纵编定的《四书讲义》可知一二。

在《四书讲义》中，吕留良指出，三代以上的“圣人”建立井田、封建等制度，是为天下人民着想，而“不曾有一事一法从自己富贵及子孙世业上起一点永远占定、怕人夺取之心”，然而秦、汉以后的许多制度都是出于君主“自私自利”的“本心”，而后世儒者“议礼”，又“都只去迎合人主这一点（自私自利）心事”，他们“所谓‘封建、井田不可复’”的意见，都只是“从他不仁之心揣拟”出来的“谬论”。他说：“自秦并天下以后，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历代因之。后儒商商量量，只从他私利心上要装折出不忍人之政来，如何装折得好？不得已反说井田、封建、学校、选举之必不可复，此正叔孙通希世度务之学。”他认为，战国至秦、汉时期之所以废除了封建、井田而推行郡县制，建立起大一统的君主制是形势所迫，却并不合理，恰恰成为“乱源”而非致治之道。他说：“封建、井田之废，势也，非理也；乱也，非治也。后世君相因循苟且，以养成其私利之心，故不能复反三代。孔、孟、程、朱之所以忧而必争者正为此耳。”又说：“君臣以义合。……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只为后世

封建废为郡县，天下统于一君，遂但有进退而无去就。嬴秦无道，创为尊君卑臣之礼。上下相隔悬绝，并进退亦制于君而无所逃。而千古君臣之义为之一变。”

吕留良的这番议论，表明他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主张立君为民、执政为民；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复封建、复井田的主张，并非复古主义，而是托古改制，甚至透露了他批判君主专制、主张君臣平等的思想倾向。这一思想倾向，与黄宗羲（梨洲）在《留书》中的“复封建”论及《明夷待访录》中的“君害”论思想如出一辙，可以说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性质。黄宗羲《留书》第一篇题名《文质》，是谈“夷夏之别”与文明进化问题的，其第二篇题名《封建》，则是严厉批判秦“废封建之罪”而主张“复封建”的。吕留良在封建、井田、君臣之义等问题上的见解，显然是受黄宗羲思想影响的结果。

极力主张严“夷夏之防”、主张恢复井田制和封建制的吕留良，理所当然地非常重视保持民族气节和士子节义的问题。这方面，他痛悔自己也曾“失脚”（即顺治十年参加清廷的科举考试并取得秀才身份），所以决然放弃秀才身份，从此与科场决裂并拒绝当局举荐，誓不仕清。这是他恪守民族气节的表现。吕留良自中年醒悟之后，始终重视出处气节，把恪守民族气节放在第一位，认为严守“夷夏之防”比谨守“君臣之义”还要重要。他以管仲可以不死于君臣之义为例，指出：“君臣之义，域中第一事，人伦之至大。……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论节义大小，不是重功名也。”又说：“圣贤于出处去就、辞受取予上不肯苟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识权变，只为经天纬地事业，都在这些子上做，毫厘差不得耳。”可见，吕留良所耿耿于怀、反复致意者，就在于他严守“夷夏之防”的民族气节。他以此为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品格的高下，对坚守民族大节、誓不降敌的爱国志士文天祥等人推崇备至，写下了“请看宝祐四年榜，六百一人何麟麟！宇宙只愁文陆谢（指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其余五甲皆灰尘”的诗句，而对一些投降“夷狄”、甘为异族臣民的名儒则十分鄙视。如他在与友人书中批评背宋事元的名儒郝经、虞集、吴澄、许衡等人说：“以《春秋》视数子，曾不如其无有耳，岂数子之著作讲学犹有未工哉？亦或失其义也。”在吕留良看来，郝、虞、吴、许等人并非没有学问，但因为丧失了民族大

义，所以不屑一顾。

(2) “尊朱辟王”论

众所周知，吕留良学术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尊朱辟王。但在当时，“尊朱辟王”的思潮并非始于吕留良，而是清初思想界的一股风气，或者说是一种时尚，就连清初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也是“尊朱辟王”的。当然，清统治集团的“尊朱辟王”与民间反清学者的“尊朱辟王”，在思想动机、尊辟重点与目的方面大异其趣，不应混为一谈。尤其是在清初，“辟王”之风颇为盛行，很多人都把明朝亡国的责任，归咎于王学的“清淡”学风上。例如，顾炎武就说过：“刘、石乱华，本于清淡之流祸。孰知今日之清淡，有甚于前代者。……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显然，顾炎武是把“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责任归之于高谈“明心见性之空言”的“清淡”的，而他所谴责的“今日之清淡”，主要是指“王伯安（阳明）之良知是也”。当时另一位与顾炎武齐名的学术大师王夫之也把明末的政治腐败归咎于王学。他批评说：“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流害以相激而相成。”

其实不仅是顾、王，明清之际不少学者都发出过类似“王学亡国”的批评声音。如颜元、李塨、朱之瑜、张履祥、陆世仪、陆陇其等大率如此，吕留良堪称“其尤著者”也。

吕留良对于自己的“尊朱”立场毫不隐讳，但对别人说他“攻王”则有所保留。他说：

某平生无他识。自初读书即笃信朱子之说，至于今老而病且将死矣，终不敢有毫发之疑，真所谓冥冥然守一先生之言者也。……某尊朱则有之，攻王则未也。凡天下辨道理，阐绝学，而有一不合于朱子者，则不惜辞而辟之耳。盖不独一王学也，王其尤著者耳。……今日老兄与某得以尊信孔子之道者由孟子也，而得尊信孟子以及孔子者由朱子也。……夫陈献章、王守仁皆朱子之罪人，孔子之贼也。……盖某之辟王说也，正以其畔朱子也。

这里所谓“尊朱则有之，攻王则未也”，说明他对“攻王”的指责有所忌惮。但既称王守仁是“朱子之罪人，孔子之贼”，则不是“攻王”又是什么？所以，说吕留良“尊朱辟王”或“尊朱攻王”“尊朱反王”都不为过。问题是吕氏所尊、所攻、所辟、所反的内容如何？

从现存吕氏《四书讲义》和《吕晚村文集》等著作看，吕留良所谓“尊朱”，所尊者并不是朱子学中那一套十分复杂的义理之学，而主要是尊崇朱子学中有关纲常名教、存理灭欲、崇仁义黜功利的政治思想，并借尊朱而发挥其严“夷夏之防”、重“出处去就”的反清思想。其所谓辟王，所辟者也并非是阳明学所论“心即理”以及“知行合一”“致良知”的一套道德形而上学，而是重在攻击王阳明及其后学“蔽于禅学”“为佛作俦”以及“生心害政”“祸乱生民”的“弊害”。他在《答吴雨若（晴岩）书》中说：

朱子平生所严辟者三焉：一金溪（陆九渊），一永康（陈亮），一眉州（苏轼）也。金溪之为姚江（王守仁）不必言。若永康之功利，眉州之权衡，兼挟文章之奇，尤足以痼学士大夫之疾，故朱子辟之甚厉。

又在《复高汇旂书》中说：

道之不明也，几五百年矣。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祸乱之原，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金溪之谬，得朱子之辞辟，是非已定，特后人未之思而读耳。若姚江之非，窃佛氏机锋作用之绪余，乘吾道无人，任其惑乱。夷考其生平，恣肆阴谲，不可究诘，比之子静之八字着脚，又不可同年而语矣。而所谓朱子之徒，如平仲（许衡）、幼清（吴澄），辱身枉己，而犹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为非。此义不明，使德祐以迄洪武，其间诸儒失足不少。……故姚江之罪烈于金溪，而紫阳之学自吴、许以下已失其传，不足为法。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当先得紫阳之是。……今示学者似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扎定脚跟，而后讲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黠术，穷陆派之狐禅。

由此可见，吕留良的“尊朱”，首先尊的是朱子“严辟”陆、陈、苏之流近禅学、崇功利、尚权谋等“异端邪说”的批判精神，是朱学重视在“出处去就、辞受交接”上站稳立场、坚守气节的人格精神，然后才是朱学讲究“格物致知”“穷理主敬”的一套理论。而所谓“辟王”，攻击的重点乃在于从陆九渊到王阳明“窃佛氏机锋作用之绪余”以惑乱人心、害政祸民的“良知之黠术”与“陆派之狐禅”。所以在吕留良那里，“朱学明道”“王学祸国”的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正因如此，吕留良特别重视朱熹推崇的“四书”，而把大量精力花在评点八股时文、阐述“四书”的微言大义上面，最后形成了一部洋洋数十万字的《四书讲义》。《四书讲义》的基本内容，是阐述其崇仁义、黜功利；严“夷夏之防”、重“出处去就”；效法三代，恢复井田、封建、学校、选举制度；君臣、朋友皆“以义合，不合则离”的政治思想，甚至主张“君臣义绝，则可为寇仇”，这不能不说是惊世骇俗的观点，表明吕留良是一位既有激烈反清民族思想、又有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并具近代民主启蒙思想萌芽的思想家。

二、文学成就

吕留良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并不大，但却是一位刚劲深沉的民族主义诗人。吕留良的诗就诗体而论，以近体诗居多，古风、歌行和杂言诗也有相当数量，数量最多的是七律，不少诗是代表作。他的诗歌创作是和他的民族思想、反清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吕留良诗中最突出的主题是华夷之辨、故国之思与气节之颂。

（1）揭露清统治者的暴行，反映人民疾苦。

吕留良目睹清兵南下血腥屠杀抗清军民的暴行，写下了不少悲壮激烈、动人心魄的诗篇，如《乱后过嘉兴》诗中写道：“兹地三年别，浑如未识时。路穿台榭础，井汲髑髅泥。”“粉黛青苔里，亲朋白骨中。新来邻里别，只说破城功。”揭露了清军攻陷嘉兴，大肆屠杀抗清军民，把繁华的嘉兴城夷为废墟的罪行。又如五言古诗《田家女》就直接描写农民的苦难生活：“田家惜人工，踏车用寡女。但愁苗叶干，岂问荒机杼！天风割骨寒，尚有皮肉阻。刀剑攒饥肠，智勇不堪煮。”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寡妇，她不得不荒废纺纱织布的家务活而到田野踏水车救旱苗，是多么强烈的比较！

面对国恨家仇，吕留良写下了不少令人感怆的诗篇，如《手录从子諒功遗稿》《友人示以季臣兄唱和稿感赋》等，都是抒写作者深沉的故国之思和丧亲之痛的。在抗清失败、遁迹田园之时，吕留良悲愤莫名，“残身直与天心连，踟躅吞声不敢言”，“孤臣剩有洩澜泪，卧听悲笳时一倾”，写出了抗清失败之士的共同心声。但他仍然希望有所作为，故在《剑客行》等诗篇中借干将、莫邪和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来表达他复仇的愿望。即使到了晚年，吕留良病魔缠身，仍念念不忘反清斗争。在吕留良逝世前一年（康熙二十一年），他在《十九日暮同诸子登天宁寺塔》一诗中写道：“昔闻弱水东，楼船或过之，中有珠贝宫，可接扶桑枝。古仙既羽化，传法儿童痴。洞府日零落，鱼龙将安依？”诗中表现了诗人仍关心抗清武装斗争的成败，关心郑成功死后台湾抗清斗争的结局，诗人预见郑克塽的无能，清王朝将进一步巩固它的统治，所以诗的末尾不禁发出“服饰尽樊笼，夜半闻天鸡”的嗟叹！

（2）坚守民族大义，寄托故国之思。

吕留良重视民族大义，他的诗多写国家民族兴亡的大事，充满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炽烈的爱国精神。他的诗歌中留下了诸如“那堪荆棘铜驼影，又哭冬青杜宇魂”“甲申以后山河尽，留得江南几句诗”的悲壮、深沉、令人感怆的名句。吕留良在《次韵和黄九烟民部思古堂》诗中写道：

跃马谁当据要津，骑牛何处会真人？
闭门甲子书亡国，阖户丁男坐不臣。
黥卒敢争莖豆食，髡钳未许漆涂身。
纵然不死冰霜下，到底难回漠北春。

这首诗，集中地反映了诗人不甘失败、不仕新朝的心情与志气。这种表现故国之思的诗篇在吕留良诗集中俯拾皆是。如《季臣兄卧病欲荒园》《东庄闲居贻孙子度念恭兄》《甲辰一日》等都是直抒胸臆的诗篇，其中“十年台榭浑春梦，三月风花抵太平。夹道晓星怀北阙，横江雨夜想南京”“廿年不检戊申历，一日刚占甲子经”等诗就是作者故国之思的表露。

(3) 歌颂抗清志士，嘲讽屈节仕清者。

吕留良在诗集中热烈赞颂那些为国捐躯或坚持民族大义、终身不仕清廷的志士仁人。他写下了七律《九日书感》以歌颂坚持抗清英勇就义的民族英雄张苍水：

九日常年话一樽，今年覆甕卧支门。
亭隅独下西台泪，岛畔谁招东郭魂。
无复鹤猿依正统，独凭蛟蜃记华元。
腐儒自有伤心处，不共宾僚说旧恩。

诗中用南宋遗民谢翱在严子陵钓台哭祭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典故，抒发他对民族英雄张苍水壮烈牺牲的敬仰和哀悼之情。

又如《同德冰晦木孟举自牧官村看菊》一诗，把坚持民族气节的黄宗羲等友人喻为“名花”，并称“人生良友真如此，一日须看一百回”，可见诗人的爱憎所在。德冰，即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别号德冰。晦木，即黄宗炎，字晦木，为宗羲二弟。孟举，即吴之振，字孟举，号澄斋，为留良挚友。自牧，即吴尔尧，字自牧，之振侄，同为留良挚友。诗中同誉为“名花”“佳客”，而对那些屈节仕清的士大夫则给以有力鞭挞，嘲讽他们“入拜朱门旁，出为蓬户豪”“朝结王侯袂，暮接公府鞭”的丑态，可谓入木三分。

吕留良与黄宗羲、吴之振一起，构筑了清初浙派诗人的宗宋风格。他们相与编辑选刻《宋诗钞》九十五卷，从而在诗坛掀起了一股宗宋诗的潮流。在艺术实践上，吕留良诗重个性，反模拟，主宋调，反唐体。其诗学苏黄、学杨范、转益多师，不主一家，沉郁苍凉而又不掩其奇崛孤傲的个性，不愧为清初浙派诗坛的开山健将。

三、出版成就

吕留良作为思想家和学者，他的理学思想、他的学术成就曾受到后人的关注，但吕留良作为时文评选家和出版家却不为后世所看重，这是不客观、也是不公正的。吕留良作为时文评选家、出版家的功过是非，应该引

起后世学者的重视。当今出版的吕留良文集,读者可以从留良与友人往来的书信中看到,吕留良频繁地将他所关注的焦点放置在书籍刻印和出版经营方面。他习惯性地书信开头和结尾处提及自己的书籍出版和销售的情况,可见吕留良本人不但十分重视这项事业,其友人似乎也很在意。

吕留良自康熙五年脱离科场后,他提囊行医卖药,重操旧业继续评点时文,自然是出于谋生,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他的事业,为了反清复明。吕留良作为时文评选家,他曾长期从事评选八股时文。起初是当时明末文人结社的风气使然,其次是歧路彷徨而失足下海。自康熙五年之后,吕留良重操旧业,再度评选时文,旨在反清复明、尊朱辟王,具有强烈的经世色彩。吕留良利用富裕的家庭条件,雇刻工,开“天盖楼”刻局,刻印图书出售。经他评点印行的时文选本,通过南京书商发售全国。康熙年间,“天盖楼本子风行海内,远而且久”。吕留良评选时文近二十年,选刻时文有《大题观略》《小题观略》《程墨观略》《东皋遗选》《归震川稿》《黄陶庵稿》《江西五家稿》等多达20余种;吕留良又在张履祥等人的支持、协同下刻印《朱子遗书》多种,据查,吕留良刻印的《朱子遗书》有《近思录》《延平答问》《中庸辑略》《伊洛渊源录》等多种,其中最受人重视的是《近思录》。他在《与张考夫书》中说:“救正之道,必从朱子。求朱子之学,必于《近思录》始。”又说:“凡朱子之书有大醇而无小疵,当笃信死守而不可置疑凿于其间。”张履祥还提议选编《朱子近思录》一书,康熙十三年,张履祥只编辑出部分选目就驾鹤西去,后由吕留良补辑《朱子近思录》,由留良长子公忠刻印《四书朱子语类摘钞》一书面世。

吕留良为了弘扬朱子之学,为了尊朱辟王,可谓不遗余力,费尽了心机。吕留良与友人交往中所关注的重点几乎都围绕他的时文选本的出版与发行,他一方面向友人报告他的出版状况,另一方面告知友人他所需要的藏书,是需借助他们的协助才能顺利获得。吕留良托付友人寻找藏书时的殷切态度也可见一斑。康熙十二年(1673)春,吕留良为搜书出游至南京,因而结识藏书家黄虞稷、周在俊、徐州来和十竹斋主人胡正言等人,将其所刻时文《程墨观略》《大题观略》等书运往南京承恩寺书坊发售,发行量不断增加。吕留良因此成为名噪一时的出版家、时文评选家。这年十月,吕留良与施愚山相会于南京。施愚山,名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安徽宣城人。清顺治六年进士,官江西布政司参议。施愚山诗名甚高,与宋琬齐

名，号“南施北宋”。后二人有书信往还。留良作《与施愚山书》，称：“先生不鄙其愚，伏望更有以垂海之，幸甚，幸甚！比欲搜寻三百年八股文字，成《知言集》一书。凡经生、社稿无不入选。贵郡为声气渊源，遗文必多，望为某一访购罗致，感何如之！”吕留良广泛搜罗前朝文章并汇成《知言集》一书，其用意是很明确的。吕留良所在乎的并不是时文，而是附藏于时文之后的道理所在。应该承认，吕留良刻印的时文选本并不只是单纯地为了谋生，吕留良时文选本也曾影响了康熙年间的一代文风。

四、医学成就

说起吕留良的医学成就，缘自一段特殊的经历。那是清顺治十七年六月，经黄宗羲二弟黄宗炎介绍，高旦中与宗炎同至语溪探视吕留良，适逢吕留良身体不适，正卧病在床，即请旦中为之诊治，服药，不几日，留良病体痊愈。高旦中，名斗魁，字旦中，号鼓峰，浙江鄞县人。为抗清志士，浙东名中医。留良敬佩旦中的医术和为人，即与旦中订交。吴之振称旦中与留良“意气神合，一揖间订平生之交”。此后旦中即寓居语溪行医，留良与旦中结下深厚的友谊。

吕留良的行医，既非家传，亦无师承，他是自学成材。高旦中寓居语溪行医卖药多年，吕留良得机跟旦中学医。应该客观地说，吕留良的医术得自浙东温补派名医高旦中的传授，加以自己的悉心钻研，遂成良医。高旦中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诊法、脉义、二十五方论及内、外、妇、儿科常见疾病的辩证施治，均有独到心得。吕留良自顺治十七年跟高旦中订交，在多年交往中，耳濡目染，跟旦中学习医理，钻研医案，得以窥其奥旨，学会了提囊行医。由于吕留良看好了多个疑难病症的病人，于是声名蜚然，慕名求医的病人日见增多，吕留良也成了名闻遐迩的名中医。吴之振曾作《医宗己任编弁语》称：鼓峰（高旦中）“庚子过东庄（东庄，即南阳村庄，留良字庄生，又号东庄），意气神合，一揖间即订平生之交，相与讲论道义，留连诗酒，因举其奥以授东庄。东庄天资敏妙，学有源本，……不数月间，内外贯彻，时出其技以治人，亦无不旦夕奏效”。吕留良在世时曾刻印过两本医著，一本是《东庄医案》，收录他行医的30个医案，为康熙间刻本。清人杨乘六将吕留良的《东庄医案》与高旦中的《四明医案》同辑入《医

案已任编》，并加了评语。吕留良另一本医著题为《医贯》，为名中医赵献可所撰，吕留良评点，又题《吕晚村偶评医贯》，康熙初年刻印。

作者简介：

吴光（1944— ），男，浙江淳安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

徐正（1933— ），男，浙江浦江人，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桐乡市凤鸣诗社社长，桐乡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理事，桐乡市吕留良研究会顾问，浙江省儒学学会名誉理事。

目 录

前言：试论吕留良的思想文化成就	吴 光 徐 正	1
从吕留良对朱学的阐发与传布看程朱理学在清代的发展与演变		
——兼就“理学在明清之交终结”说质疑	王俊义	1
“政治化”的朱子学——吕留良事件的立场	伊东贵之	16
理想的世界——试析吕留良诠释下的“封建”制度	史曜莒	41
论吕氏家刻本对清初朱子学传播之影响	程水龙 崔丛华	55
一部残稿有“遗”恨		
——论吕留良的遗民情怀与其诗歌创作	黄 意	72
吕留良诗歌略论	徐 正	90
为人清高景仰起 清辉照人敬此生		
——从吕留良削发为僧看其身份的多重性	王晓霞	100
浅谈吕留良的家风家训	鲁东平	111
吕留良经商思想探略	徐玲芬	120
吕留良与医学		
——以《吕晚村先生评医贯》为中心	杨东方 周明鉴	128
“涉世利生”之下的士风转型		
——以吕留良为中心的考察	杨念群	156
从曾静案看十八世纪前期的社会心态	王汎森	193
吕留良文字狱案与崇德吕氏文化家族的衰变	张毓洲	231
吕留良文字狱对石门县士林的影响	颜剑明	246

从张履祥、吕留良到陆陇其

——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的一条主线 张天杰 252

黄宗羲、吕留良交恶与澹生堂藏书之关系 赵永刚 281

清初明遗民之浩然正气

——以吕留良和黄宗羲为个案的考察 钱晓晨 293

吕留良与吴之振交游述略 俞国林 308

吕留良与孙爽的交游 张森生 331

严鸿逵对吕留良反清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基于对严鸿逵、吕留良日记的对比考察 余杭 339

史实和传说的区别

——关于吕留良的真实人生和民间传说的解读 沈海清 352

吕留良家乡遗迹考 蔡一 359

寻访吕留良后裔流放地宁古塔 徐正 367

后记 376